

次贷危机以后全球失衡的调整模式与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变化

于春海

摘要：在次贷危机以来的全球贸易失衡的调整过程中，服务贸易收支的逆向调节作用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演变过程表现为产品贸易顺差规模的增速下降、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的增速上升以及总贸易顺差的增速更加显著的下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迅速增长的趋势在短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这也在一定程度意味着，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带来的主要是服务进口的增长，对国内供给结构调整和服务业扩张的拉动作用较小。在现有趋于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制成品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不会逆转，但是增长速度会趋势性下滑，并逐步趋向外部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

一、引言

在外向型增长战略之下，净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需求力量。2000年至2007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拉动率达到1.2个百分点。在次贷危机以后，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基本消失。虽然世界经济在2010年之后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健的复苏进程，但是，在2010年至2013年之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拉动率为-0.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从总需求的角度看，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变成负的。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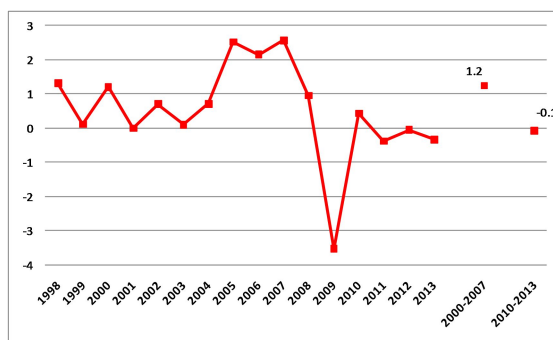


图1 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率 (%) ²

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由正转负，作为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净出口余额的下降。具体来看，在产品贸易方面，净出口在2009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同比下降，2010年以后又恢复增长。在服务贸易方面，我国基本都维持在逆差状况。在次贷危机以后，特别是在2009年以后，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规模迅速扩大。总之，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由正转负，一方面是因为产品贸易顺差的增长趋缓，虽然还能够从正向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正向拉动作用显著地低于危机以前；另一方面，服务贸易逆差在次贷危机以后迅速扩大，对经济增长施加越来越大的负向拉动作用。两者相抵，使得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由正转负。

¹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此并没有考虑对外贸易的间接作用，特别是进口对国内生产和资本形成过程的影响。无论产出是内销还出口，进口的基本作用是满足国内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我国的进口中，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国内的生产投入需求，包括对初级产品、中间投入和资本品的需求。因此，从需求角度来看，进口的增加可能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投入方面看，进口增长却有助于国内资本形成和生产的扩张。

² 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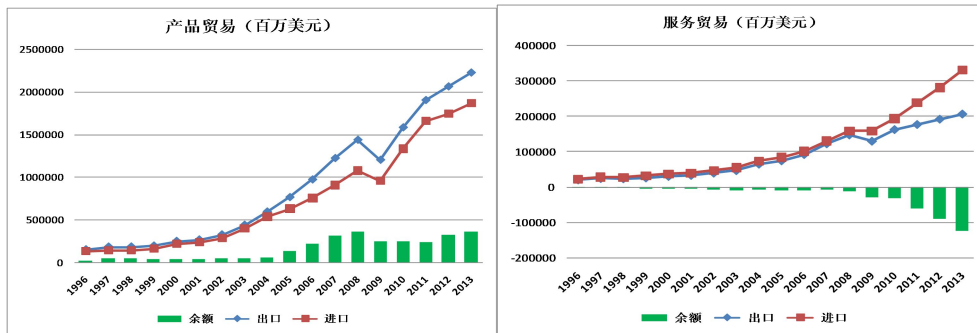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产品和服务贸易余额的变化¹

如果上述变化是某种长期趋势的开始,也就是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拉动率将会成为一个长期现象。那么,传统观念中外向型增长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石,即正的需求拉动效应,将不复存在。由此,需要重新思考对外贸易之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重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需要分析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通过分析次贷危机以后全球失衡的调整模式、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演变以及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增长趋势,寻求对上述现象的性质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二、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失衡的调整模式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贸易收支状况的演变,都离不开全球失衡这一大背景。因此,次贷危机以后全球失衡的演变及其背后原因的分析,就成为我们分析我国净出口未来走势的起点。²

(一) 全球失衡调整过程的特点

当前全球失衡调整过程的第一个特点是:经常项目失衡的调整过程快于贸易失衡的调整过程。从图3中可以看出,全球失衡规模在2006年达到了一个历史顶峰,此后随着则是不断下降。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全球经常项目失衡规模显著下降。2006年至2013年,全球经常项目失衡规模占世界GDP的比重从5.3%降至3.4%。在全球整体失衡规模下降的同时,失衡的国别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美国、日本和中国作为过去的主要失衡国,经常项目失衡占世界GDP的比重大幅下降;德国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失衡中最大的顺差国;欧洲其他经济体的失衡规模显著上升;石油出口国依然维持较高的失衡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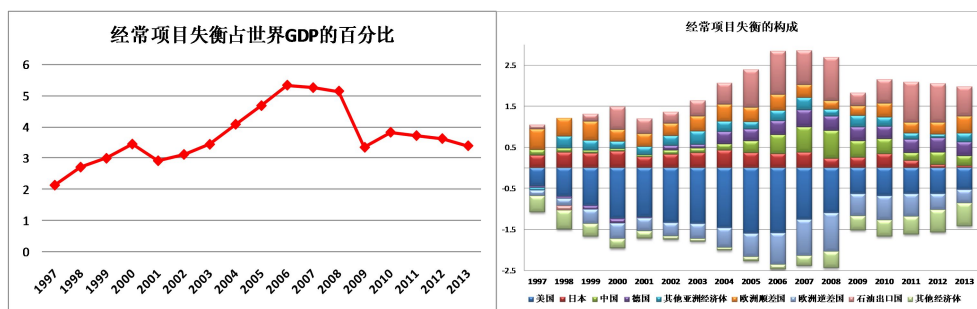


图3 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演变³

与2006年的峰值相比,次贷危机以后全球贸易失衡规模明显下降,这与经常项目失衡状况类似。但是不同于经常项目失衡,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中,贸易失衡占世界GDP

¹ 数据来自 UNCTAD 数据库。

² 如果分别把顺差国和逆差国看作是全球失衡中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那么,我国作为全球失衡中的主要供给者之一,对外贸易收支状况的演变就不是单向地依赖于全球失衡状况,而是更为复杂是双向相互依赖。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失衡状况及其演变对我国外贸收支的影响。

³ 所有经济体经常项目余额的绝对值之和占世界GDP的百分比,数据来自 IMF2014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的比重不仅没有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反而呈现重新增长的趋势。贸易失衡状况与经常项目失衡状况在危机后的演变趋势具有明显的差别，特别是经常项目失衡调整快于贸易失衡的调整。经常项目与贸易项目的最大区别在于收益项，其中又以投资收益为主。因此，经常项目失衡调整领先于贸易失衡调整，意味着目前所出现的全球失衡调整主要是金融层面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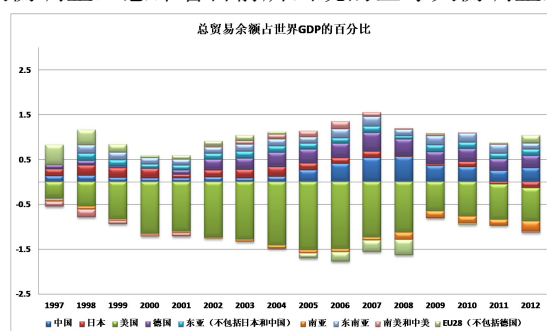


图4 全球总贸易失衡的演变¹

当前全球失衡调整过程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全球贸易收支中，服务贸易与产品贸易具有明显不同的变化趋势。产品贸易失衡规模的增幅在次贷危机后明显下降，而服务贸易失衡规模的增幅明显提升。服务贸易收支状况及其变化对总贸易收支状况的影响显著提升。从图5中可以看出，除了德国和日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余额规模在次贷危机以后的年均增幅都小于危机以前，服务贸易余额规模的年均增幅都大于危机以前。次贷危机以前，在中国、美国、德国、南亚、东南亚、中美和南美，总贸易收支余额与产品贸易余额的差别非常小。次贷危机以后，日本、德国和东南亚的总贸易收支与产品贸易收支在变动方向和幅度上基本一致，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在不包括德国的欧盟27国，在危机以前，服务贸易收支的变动幅度在绝对量上远小于贸易收支的变动幅度；在危机以后，服务贸易收支的变动幅度明显超过了产品贸易收支的变动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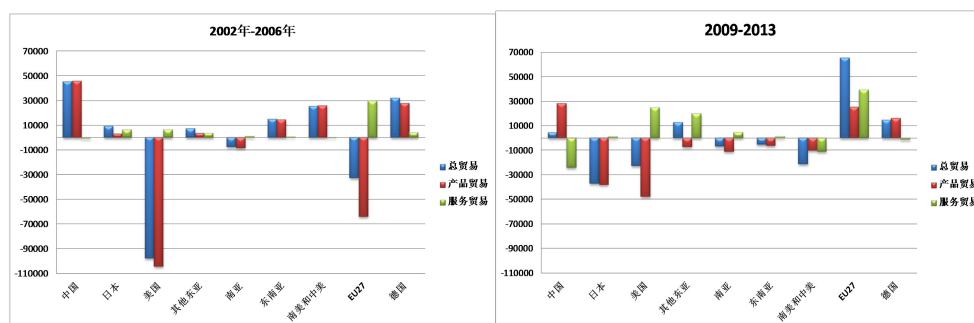


图5 主要地区贸易失衡规模的年均增长幅度（百万美元）²

当前全球贸易失衡调整过程的第三个特点是：服务贸易收支的逆向调整作用不断增强。也就是说，在产品贸易中处于大规模逆差状态的经济体，服务顺差迅速增加；在产品贸易中处于大规模顺差状态的经济体，服务贸易逆差迅速增加。从图5中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增量几乎完全抵消产品贸易顺差的增量；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增幅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总贸易逆差规模的扩张幅度；在其他东亚经济体³，产品贸易收支不断恶化，服务贸易收支的改善是总贸易收支改善的唯一来源；在南亚地区，服务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总贸易收支的恶化。

（二）原因分析

对于贸易失衡调整滞后于经常项目失衡的调整，本文不想展开分析，因为对此的分析要

¹ 数据来自 UNCTAD。

² 数据来自 UNCTAD。

³ 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韩国、朝鲜和蒙古。

涉及太多的金融层面的因素。我们想要分析的是为什么贸易失衡调整主要依赖于服务贸易收支的反向调整。在产品贸易失衡规模没有出现明显的逆向调整趋势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失衡的反向调整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失衡调整的主导力量。对此现象不应该简单地解读为赤字国内需求的压缩。¹

假设有这样一个经济体，在其国内供求结构对比中，有形产品处于超额需求状态，服务处于超额供给状态。与这样的供求结构相对应的外部收支状况应该是产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图 6a 所示）。但是由于服务的可贸易性较低，相对过剩的服务供给并不能全部转变成对外贸易顺差。为了避免服务供给过剩导致服务业的萎缩，需要提高国内的服务需求。给定需求结构的刚性约束，只有通过扩张国内总需求，才能实现国内服务需求的增长。在这样的平衡过程中，产品超额需求增加，服务超额供给减少，结果是大规模产品贸易逆差和小规模的服务贸易顺差（图 6b 所示）。这里所分析的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情况。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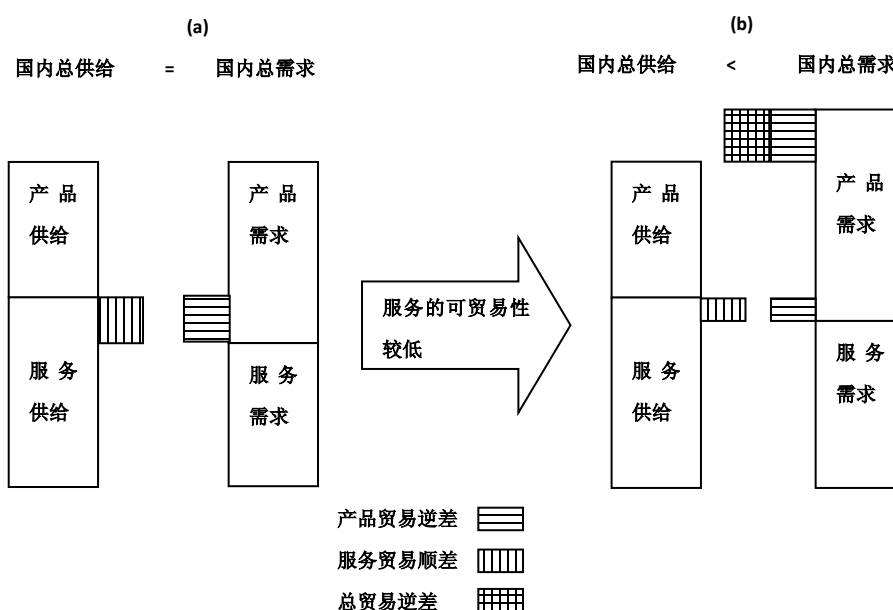


图 6 从国内供求结构差异到贸易失衡

再假设存在另一个经济体，在其国内供求结构对比中，有形产品处于超额供给状态，服务处于超额需求状态。沿着同样的逻辑，在供求结构约束下，为了实现宏观经济平衡，只能通过压缩国内总需求来降低服务供给缺口，但是同时导致产品的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结果就是大规模产品贸易顺差和小规模服务贸易逆差。这所对应的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情况。³因此，给定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对比状况，贸易失衡的产生及具体表现，都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对于这样的失衡状况，传统的需求变更和需求转移政策难以奏效。以图 6 所示的逆差国为例，要减少贸易逆差，一个最为直接的切入点就是利用需求变更政策减低产品需求。受制于需求结构的刚性约束，只能借助于总需求的降低才能实现产品需求的降低。姑且不论降低国内总需求的政策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在给定供给和需求结构的情况下，即便能够通过需求变更政策实现总需求的降低，结果也只是重回图 6a 所示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失衡并存的状态。

另一个办法是利用汇率调节等需求转移政策，实现全球范围的需求转移，推动贸易再平

¹ Lane and Milesi-Ferretti (2012)认为，目前全球失衡的调整过程主要是依靠赤字国压缩需求。IMF(2014)认为，次贷危机后失衡调整的主要驱动力来自赤字国需求水平的下降，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大宗商品出口国国内需求的扩张。参见 IMF2014 年 10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² 目的是为了服务业扩张的正外部性和就业创造等好处。对此问题的分析，参见于春海（2009）。

³ 参见于春海（2010）。

衡过程。但是，需求转移政策直接影响的是国际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则依赖于需求和供给的同时调整。以图 6 所示的逆差国为例。在需求方面，相对价格变化能否推动全球需求从外国产品转向本国产品，以及本国国内需求从产品向服务的转移？这依赖于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性。¹由于产品和服务在属性上存在显著差别，相互之间的替代性不高。因此，需求转移只能表现为国内外产品之间的转移和国内外服务之间的转移。初始状况是国内有形产品供给不足，如果没有供给层面的调整，那么，产品需求从外国产品向本国产品的转移是无法实现的，期望的产品贸易逆差下降也是无法实现的。在服务方面，国内的初始状况是供给过剩，服务出口的扩张是有供给基础的。但是，制约服务出口扩张并不是相对价格，而是服务过低的可贸易性。因此，相对价格调整同样也是缺乏效率的。²

在缺乏供给调整配合的情况下，需求调整政策难以奏效，因此，贸易再平衡调整必须转向供给层面。对于图 6 所示的逆差国，可供选择的一种调整路径是提高国内有形产品的供给能力，降低对进口有形产品的依赖性。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有形产品供给的上升必将伴随着服务供给的下降，这意味着总供给结构的改变。从图 6b 出发的状况，随着国内总供给中有形产品比重的提高，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缩小。这不仅可以直接减低产品贸易逆差和总贸易逆差，还为压缩国内总需求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国内产品供给的相对上升和服务供给的相对下降，在给定服务贸易空间的情况下，国内产品需求下降导致产品贸易逆差进一步下降，国内服务需求下降不会导致服务供给过剩状况的加剧。这是通过供给调整实现贸易再平衡的基本逻辑。

供给层面的调整在理论逻辑上是可行的，但是考虑到失衡国的具体情况，可能就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制成品是其最大的非石油类进口产品。产品供给能力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供给能力的提高。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去工业化”过程相对应，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过程被称为“再工业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只是将原先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转变成国内生产，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向外转移制造业的过程相对应，就可以被称为“制造业回流”或者“进口替代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是在不改变全球供给和需求模式的条件下，对全球供应网络的地区配置的重新调整。在区位优势和需求状况没有质变的背景下，全球供应网络难以出现大的调整。从微观层面看，在失去了市场份额、固定资本、投入供应网络、产出营销网络、生产技能、专有知识和相关制度后，重新积累生产能力是很困难，上述因素的积累都需要很长时间。³加之国际市场结构的变化和低成本生产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主导地位已经建立起来，美国在去工业化之后想要重新进入相关行业，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的增值能力和利润水平无法吸引美国国内企业的进入。

而且，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扩张，意味着其他部门的萎缩，特别是服务业的萎缩。从美国的禀赋条件、技术水平、生产模式等来看，制造业产出的扩张主要依靠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不是劳动投入的增加。美国制造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增长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 2000 年以后，劳动投入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基本都是负的。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并不能带来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在进口替代的“再工业化”过程中，无论是现有制造业的扩张，还是重建原先被淘汰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这对服务业的替代并不能带来新增就业机会，反而会导致就业机会

¹ Engler, P., M. Fidora and C. Thimann, 2006, “External Imbalances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How Supply-Side Changes Affect an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

² 针对过去几年的贸易失衡调整过程的研究表明，实际汇率的变化并没有明显作用。参见 IMF(2014) 2014 年 10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³ 根据 Tregmenna (2011) 的研究，高收入国家在经历“去工业化”过程之后，没有出现过“再工业化”的现象。参见：Tregmenna F.,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industrializatio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2011/57, September 2011.

的进一步减少。¹

因此，简单的进口替代调整战略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那么，具备现实可能性的调整路径是什么？在前文的分析中，在供求结构差异与贸易失衡的联系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约束条件，也就是对服务的可贸易程度的约束。服务的可贸易程度严格限定了国内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异程度。现实中，服务的可贸易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服务需求的规模，二是服务市场的可进入程度。

在全球服务需求规模方面，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为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被配置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为了协调不同地点的生产活动，需要分销、电信、网络、金融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服务。此外，随着新兴经济体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整个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带来了基础设施服务的巨大需求。²这两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全球服务需求规模的迅速扩张。

在服务的可贸易性方面，技术进步改变了服务的提供方式，特别是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远距离服务供给成为可能。使得服务可贸易性的提高具备了技术可能性。³更为重要的是政策性服务贸易壁垒的下降。进入 21 世纪，在服务的直接跨境出口方面，政策性壁垒依然很高，包括边界壁垒和边界内壁垒。根据估算，服务贸易中的管制、许可和其他壁垒带来的影响等价于 30% 以上的关税税率。⁴限制服务业可贸易性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性因素，包括服务市场开放、人员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近年来，在多边贸易体系以外“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次多边框架下解决服务贸易壁垒居高不下的困境。在多边和次多边政策协调之外，发展中与新兴经济体为了实现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型，纷纷采取提高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的单边行动。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服务贸易壁垒不断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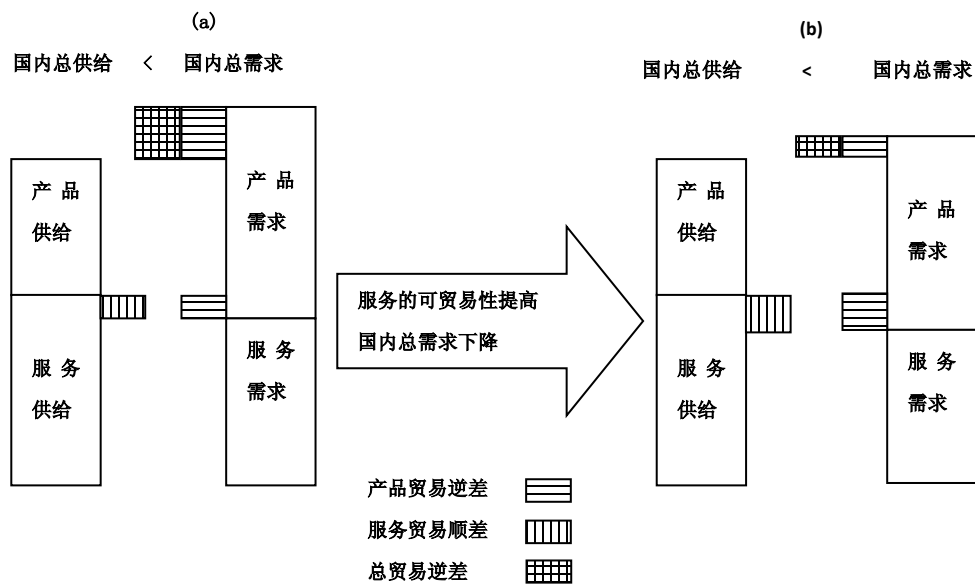


图 7 贸易失衡的调整模式：提高服务可贸易性和压缩国内总需求

对于前面所分析的逆差国，全球服务需求规模的扩张和服务贸易壁垒的下降，意味着国内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之间的差异程度可以扩大。从图 7a 的失衡状况出发，在国内供给结

¹ USITC. (2012) *Recent Trends in US Service Trade: 2012 Annual Report*, USITC, Publication No. 4338.

² Baldwin R. (2011a)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21st Century Trade and 20th Century Trade Rule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1-08; Jensen, J. B. (2012) Opportunities for US Exports of Business Services,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³ USITC. (2008) *Recent Trends in US Service Trade: 2008 Annual Report*, USITC Publication No. 4015.

⁴ Jensen, J. B. (2012) Opportunities for US Exports of Business Services,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构和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全球服务需求规模和可贸易程度的提高，压缩国内总需求的政策将不会对宏观经济平衡状况产生负面冲击。随着国内总需求的下降，一方面是国内服务供给的过剩状况加剧，但是这可以顺利地转变成对外服务贸易顺差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国内产品需求与供给的缺口收缩，导致产品贸易逆差规模的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总贸易逆差规模的下降（如图 7b 所示）。对于前面分析的顺差国，在同样逻辑之下所出现的调整过程应该是，国内总需求上升、产品贸易顺差规模下降和服务贸易逆差规模上升，以及总贸易顺差规模下降。

三、全球失衡调整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演变

（一）总体状况

与危机前相比，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状况在危机后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产品贸易顺差规模的增速下降、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的增速上升以及总贸易顺差的增速更加显著的下降。这一变化过程基本符合前面的失衡调整逻辑。2002 年至 2007 年，我国总贸易顺差年均增加 541.3 亿美元，产品贸易顺差年均增加 543.6 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年均增加 2.3 亿美元。危机影响最严重的 2008 年和 2009 年，产品贸易顺差的增幅由正转负，产品贸易顺差规模下降；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的年均增幅上升，服务贸易逆差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我国总贸易顺差规模下降。2010 年至 2013 年，我国产品贸易顺差恢复增长，但是年均增幅只有危机前的一半左右；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的年均增幅急剧上升；两者相抵，导致我国总贸易顺差的年均增幅急剧下降（见图 8）。我国贸易收支的变动路径符合上一节中界定的顺差国的失衡调整模式。前文在给定国内供给结构和总量的情况下，得出顺差国的调整模式是产品贸易顺差下降、服务贸易逆差上升和总贸易顺差下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在给定结构特征下的供给总量扩张，那么在同样的逻辑之下，顺差国的调整路径就是产品顺差规模的增长趋缓、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的增长加速以及总贸易顺差规模的增长趋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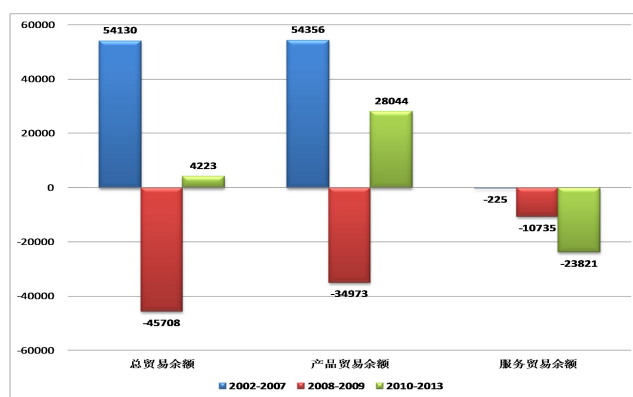


图 8 我国贸易余额的年均增幅（百万美元）¹

（二）制成品贸易收支的变化

在我国的产品贸易中，制成品处于顺差状态，初级产品处于逆差状态。在危机后，两者都延续了过去的扩张势头（见图 9）。初级产品贸易逆差规模的不断增长，是我国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增长的生产投入需求与国内日益严重的资源禀赋约束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但是必须注意到，在初级产品贸易逆差变动的背后不仅是实体经济供求的作用，国内外货币和金融因素驱动下的价格变化也施加了显著影响。本文对此无法展开全面的分析，因此，我们接下来主要针对制成品展开分析。

¹ 数据来自 UNCT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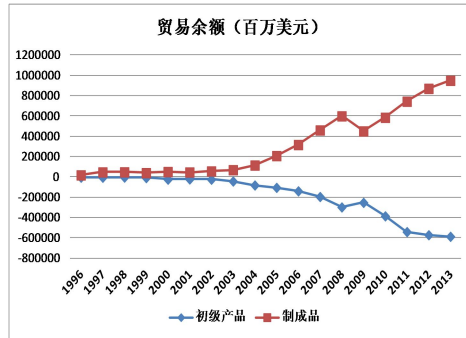


图9 我国的产品贸易余额¹

在制成品方面，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和杂项制品（SITC8）是我国最大的顺差来源，机器和运输设备（SITC7）是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第二大来源。在化工产品（SITC5）上，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从图10中可以看出，在危机过程中，机器和运输设备的贸易顺差虽然能够维持增长的势头，但是增速显著下降；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贸易顺差出现了负增长；制成品的整体贸易出现负增长。2010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恢复增长，并且年均增幅明显高于危机以前。2010年至2013年，在主要制成品类别中，化工产品依然处于逆差状态，逆差规模的年均增幅与危机前相近；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器和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的贸易顺差恢复增长，并且年均增幅高于危机以前，特别是按原料分类制成品与杂项制品，年均增幅的提高尤为显著（见图10）。总之，次贷危机以后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势头并没有逆转，2010年以来的平均增幅明显高于危机以前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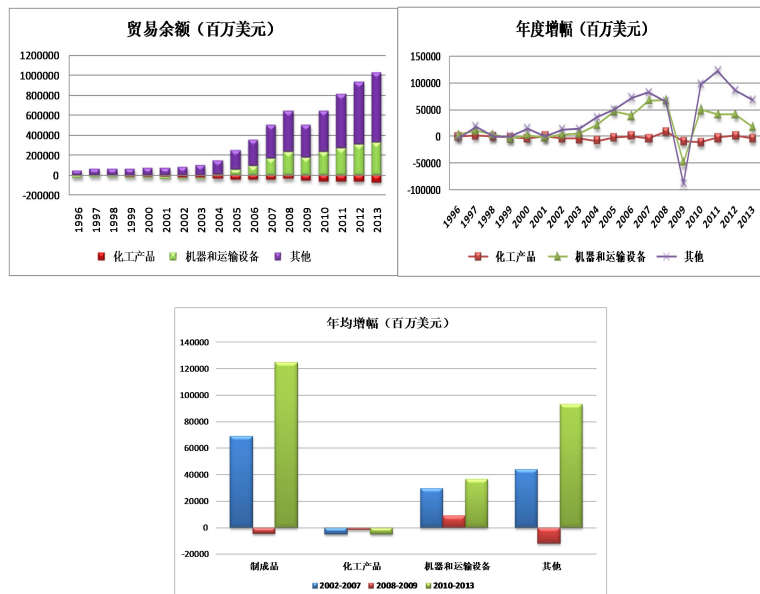


图10 我国制成品贸易余额的构成及变化²

次贷危机以后，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年均增幅的提高主要来自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见图10）。从图11中可以看出，机器和运输设备的出口增幅和进口增幅先相对于危机前都有明显提高，但是出口增幅提高的程度稍大一些，进而导致贸易顺差增幅相对于危机前的小幅提高；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上，不仅出口增幅相对于危机前的提高幅度更大，而且进口增幅基本没有变化，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贸易顺差增幅相对于危机前

¹ 数据来自 UNCTAD。

² 其他类别包括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和杂项制品（SITC8）。数据来自 UNCTAD。

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由此可以认为，虽然机器和运输设备在 2005 年以后已经成为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增量，其重要性都远低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特别是在次贷危机以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在增量意义上对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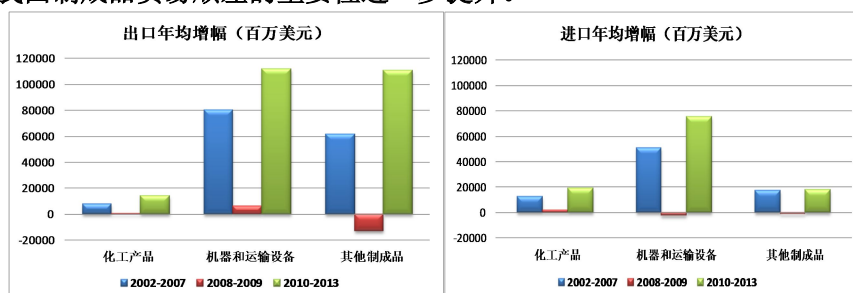


图 11 我国制成品出口和进口的变化¹

总之，次贷危机以后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势头并没有逆转，2010 年以来的平均增幅明显高于危机以前的水平，这主要得益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还是机器和运输设备，贸易顺差的增幅在 2010 年以后都是逐年下降的。这是否会成为一种长期趋势，甚至成为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增长趋势逆转的起点？对此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三) 服务贸易收支的变化

我国的服务贸易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9 年以后逆差规模迅速扩张。从主要的服务类别来看，旅行服务²在 2009 年以前一直处于顺差状态，2009 年以后转变为逆差状态，并且逆差规模迅速扩大；运输服务³一直处于逆差状况，2009 年以后逆差迅速扩大；在其他服务类别⁴上，2009 年以前处于逆差状态，2009 年以后转变为顺差状态。总体而言，运输服务和旅行服务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来源。（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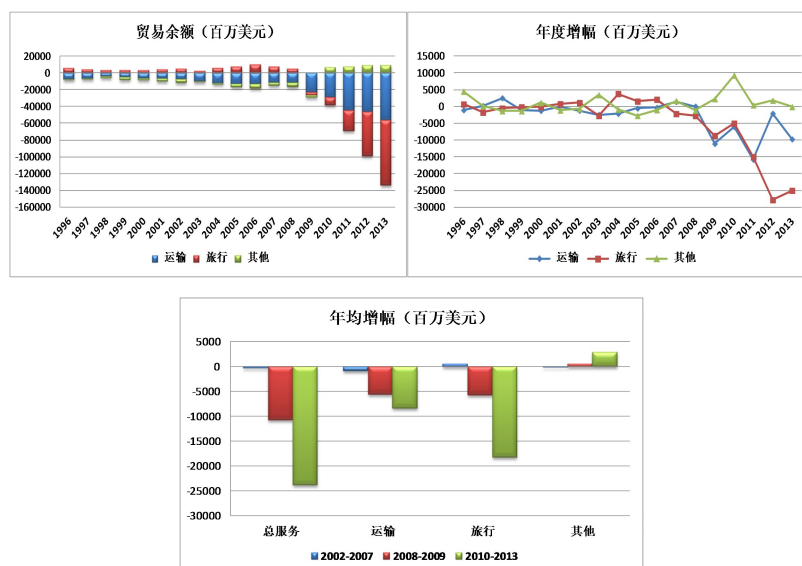


图 12 我国服务贸易余额的构成及变化⁵

¹ 数据来自 UNCTAD。

² 旅行服务包括非居民在短期游览过程中购买的产品和服务。

³ 运输服务包括客运服务、货运服务、交通工具租赁以及相关支持性服务。

⁴ 其他服务包括通讯服务、建筑安装服务、金融和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版权和许可服务、商贸服务、经营租赁服务、其他商业、专业和技术服务、个人文娱服务以及政府服务等。

⁵ 数据来自 UNCTAD。

从图 12 中可以看出，与危机前相比，2010 年以后我国服务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左右，并且所有服务类别的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服务进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下降了 2 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在不同服务类别上的差异非常明显。旅行服务进口的平均增长速度大幅提升，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左右；运输服务进口的平均增速下降了 5 个百分点左右；其他服务进口的平均增速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可以认为，**旅游服务进口的迅速增长是导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扩张的最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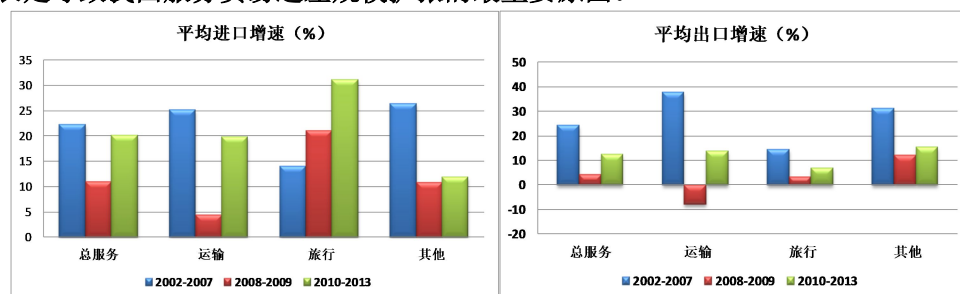


图 13 我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的变化¹

就时间节点来看，我国旅游服务进口的迅速增长与次贷危机后内需刺激政策具有很明显的同步性。这又是为什么？前文的分析指出，国内供求结构差异是贸易失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国内供求结构差异表现为产品的超额供给和服务的超额需求。在此背景下，刺激内需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对服务的超额需求，也就是对境外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随着境外服务供给和可获得性的提高，我国的服务进口自然会迅速增长。

按照较为粗略的分类标准，旅行服务主要属于消费型服务，“其他服务”主要属于生产型服务，运输服务既包含生产型服务、也包含消费型服务。在消费型服务和生产型服务的对比中，消费型服务的跨境供给主要依赖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形式；生产型服务的跨境供给不仅可以通过直接的跨境贸易形式来实现，还可以通过以有形产品为载体的间接贸易模式以及境外分支结构销售的模式来实现。²因此，对境外生产型服务需求的增加不一定表现为服务进口的增长，可能表现为产品进口的增加或者服务业 FDI 流入的增加，而对境外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往往直接表现为服务进口的增长。³总之，在国内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内需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服务的超额需求状态，进而增加了对国外服务的需求。生产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既可以借助直接的服务贸易，也可以借助以有形产品为载体的间接贸易或者服务业 FDI，因此，对境外生产型服务需求的增加不会全部转变为进口的增长。而对于旅游这类的消费型服务，跨境供给主要依赖于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因此，对境外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直接转变为进口的增长。

由此，我们需要关注开放背景下需求引致型的结构调整政策的效果，特别是国内服务需求增长对国内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首先，由于供给能力的调整过程相对较为缓慢，所以，内需刺激政策虽然能够推动国内服务需求的迅速增加，但是在短期中的影响主要是服务贸易逆差的增加。其次，不同类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模式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生产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更加倚重境外分支机构销售的模式，生活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更加倚重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因此，对境外生产型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带来服务业 FDI 流入的增长，这对国内供给结构调整和服务业扩张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对境外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

¹ 数据来自 UNCTAD。

² 服务跨境供给的渠道主要有：1) 以有形产品为载体，通过有形产品的出口实现服务业的间接出口；2) 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3) 海外分支机构的服务销售。参见：USITC. (2013) *Recent Trends in US Service Trade: 2013 Annual Report*, USITC Publication No.4412.

³ 在现实中，生产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更加依赖海外分支结构的服务销售。以美国为例，专业和商业服务企业通过海外分支结构实现的服务销售规模是美国服务出口的 2 倍左右。参见：USITC. (2013) *Recent Trends in US Service Trade: 2013 Annual Report*, USITC Publication No.4412.

带来的主要是服务进口的增长，对国内供给结构调整和服务业扩张的拉动作用较小。

四、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趋势的分析

就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而言，我们需要关注的主要是制成品贸易的走势，而不是整体的对外贸易。基于我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对比关系，初级产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是弥补国内供给缺口、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必然要求。在短期中，供给能力和需求结构的调整相对较小，因此，对初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状况以及贸易逆差走势不会发生大的趋势性改变。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制成品出口的增长趋势，因为这关系到我国国内过剩的制成品供给能否解决市场实现问题，进而影响我国在现有结构下的经济增长态势。

出口增长速度受制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目标市场总规模的扩张速度，二是在目标市场上所占份额的提升速度。但是对于我国的制成品出口来说，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目标市场上所占份额的迅速提升，也就是说，我国制成品出口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国际市场上的替代效应。在制成品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亚洲、北美和欧盟三个地区性生产价格价值链或网络。新世纪以来，随着制成品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向我国延伸和扩展，我国逐步成为亚洲生产价值链条上的加工、组装和出口中心，与此相伴随的必然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原有制成品供给国的替代。2000年以来，在全球制成品进口中，来自我国的份额提高了12个百分点左右，其中，电子产品的份额提高了36个百分点左右，零部件的份额提高了25个百分点左右，其他机器和设备的份额提高了8个百分点左右（见图14）。1996年至2013年，在北美、欧盟和东亚制成品市场上，我国所占份额的年均增长幅度分别是1、0.5和0.7个百分点（见图15）。越来越高的国际市场份额被我国占据，这意味着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其他制成品供给国的替代。正是源于这一替代过程，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才能远高于目标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张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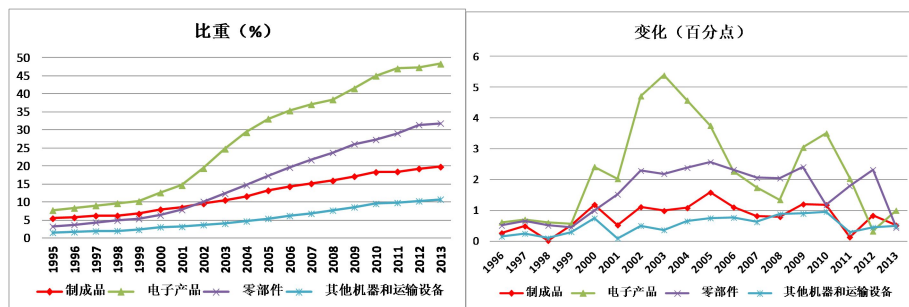


图 14 我国在世界制成品市场上的份额及变化¹

那么，我国制成品出口能否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态势，就依赖于上述替代过程能够持续。对于亚洲生产价值链条来说，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是欧美市场。在逐步成为亚洲价值链条上的加工和组装中心的过程中，我国在欧美市场上逐步替代原有的亚洲其他制成品供给者。这带动了我国对欧美市场制成品出口的高速增长。根据WTO(2011)的研究，亚洲生产价值链条的中心在2006年左右完全转移到我国。这必然导致我国在欧美制成品市场上所占份额的提升速度大幅下降。次贷危机以后，我国制成品出口在欧美市场总进口中占比的增幅明显下降。2010年至2013年，在美国的制成品进口中，我国所占份额的年均增幅只有0.2个百分点；在欧盟的制成品进口中，我国所占份额的年均增幅只有0.1个百分点（见图15）。虽然欧美市场的绝对规模很大，但是在我国所占市场份额不再提高的情况下，我国对欧美市场的制成品出口增速将严格受制于欧美市场整体规模的扩张速度。而对于欧美这样的大市场，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我国对欧美市场的制成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欧美市场在增量上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贡献将会明显下降。

¹ 我国制成品出口占世界制成品进口的份额以及这一份额的年度增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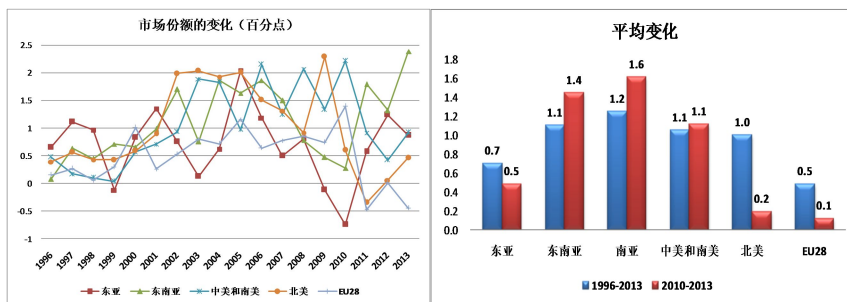


图 15 我国在主要市场上的份额变化¹

北美和欧盟市场是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1996 年至 2007 年，北美市场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拉动率是 5.2 个百分点，欧盟市场的拉动率是 4.4 个百分点。次贷危机以后，欧美市场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幅下降。2010 年至 2013 年，北美市场和欧美市场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拉动率分别是 3.1 和 2.1 个百分点（见图 16）。欧美市场拉动作用的下降，对我国制成品总体出口增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是否必然意味着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增速同步回落？对此问题，需要考察欧美以外的市场是否能够提供额外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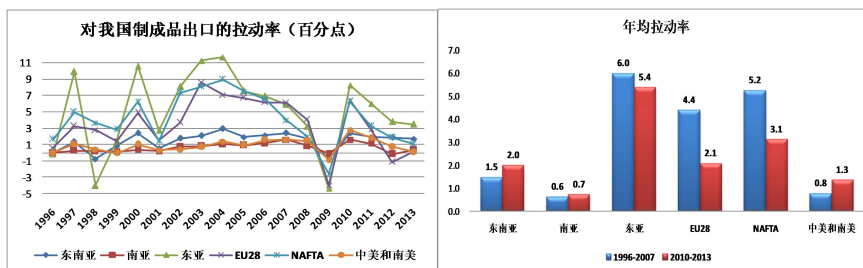


图 16 不同地区对我国制成品出口的拉动率²

从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地区结构来看，欧美市场所占份额在次贷危机以后明显下降，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增速明显低于危机以前；亚洲以及中美和南美市场所占份额明显提高，并且对这些市场的出口增速都明显高于危机以前（见图 17）。从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拉动率来看，1996 年至 2007 年，北美和欧盟市场的年均拉动率是 9.6 个百分点，亚洲和中南美洲市场的年均拉动率是 8.8 个百分点；2010 年至 2013 年，北美和欧盟市场的年均拉动率降为 5.2 个百分点，亚洲和中南美洲市场的年均拉动率增至 9.4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过程中，亚洲和中南美洲市场的作用已经明显超过北美和欧盟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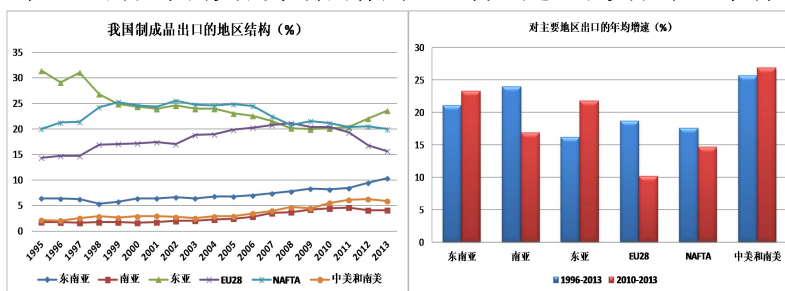


图 17 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地区结构 (%)³

从我国在亚洲与中南美洲制成品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动态变化趋势看，次贷危机以后市场份额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危机以前。从图 15 中可以看出，2010 年以后，在东亚制成品市场

¹ 在主要市场制成品进口中的占比及其变化。数据来自 UNCTAD。

² 数据来自 UNCTAD，这里的东亚包括日本。

³ 数据来自 UNCTAD，这里的东亚包括日本。

上我国所占份额均增加 0.5 个百分点；在东南亚和南亚制成品市场上，我国所占份额年均增加 1.4 和 1.6 个百分点；在中美和南美制成品市场上，我国所占份额年均增加 1.1 个百分点。由此可以认为，在亚洲和中南美洲市场上，我国对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依然存在，并且处于加速发展的状态，我国对亚洲和中南美洲市场的制成品出口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那么，在来自北美和欧盟市场的增长动力显著下降时，亚洲、中南美洲和其他新兴市场能否提供足够的增长动力，并维持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告诉增长？对比危机前后的情况，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了 3.9 个百分点。其中，北美和欧盟市场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拉动率下降了 4.4 个百分点，亚洲和中南美洲市场的拉动率上升了 0.6 个百分点，其他新兴市场的拉动率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虽然亚洲、中南美洲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地位显著提高，并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但是这些市场贡献的增长动力并不能完全弥补北美和欧盟市场增长动力的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制成品出口在未来很难恢复 2008 年以前的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不等于增长趋势的逆转。作为全球主要的制成品生产和出口大国，除非国际分工格局出现大的调整，包括跨区域重新配置和区域内重新配置，否则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增长趋势就不会逆转。

90 年代中期以后，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东亚地区的占比不断上升，欧盟和北美的占比不断下降，中美和南美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占比变化不大。1995 年至 2013 年，东亚占比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南亚占比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东南亚占比上升了 0.6 个百分点，中美和南美占比上升了 1 个百分点，欧盟和北美占比分别下降了 6.8 和 4.5 个百分点。次贷危机以来，东亚地区的占比继续上升，并且年均增幅更大。相比较而言，南亚、东南亚、中美和南美的占比，在次贷危机以来并没有明显变化。次贷危机以来，变化最大、并且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东亚和欧盟，东亚占比以更大幅度提升，欧盟占比则是以更大幅度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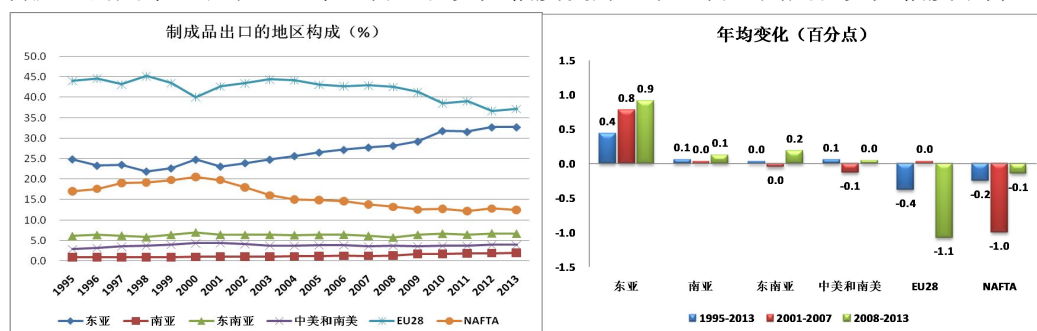


图 18 全球制成品出口的地区结构¹

进一步考虑我国在东亚的地位。东亚地区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占比的上升基本都是来自中国占比的上升。1995 年至 2013 年，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上升了 9.6 个百分点，中国上升了 15.1 个百分点。次贷危机以来，上述趋势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2008 年至 2013 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年均上升 1.2 个百分点，中国占比年均上升 1.1 个百分点。由此可以认为，在全球制成品贸易结构中，东亚地位持续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受到危机的明显影响；在亚洲区域内，没有出现南亚和东南亚替代东亚的趋势；在跨区域方面，东亚对欧盟的替代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也没有出现南美和中美洲经济体替代东南的趋势；无论是东亚地区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地位，还是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都没有出现有别于危机前的根本性变化。

¹ 数据来自 UNCTAD，这里的东亚包括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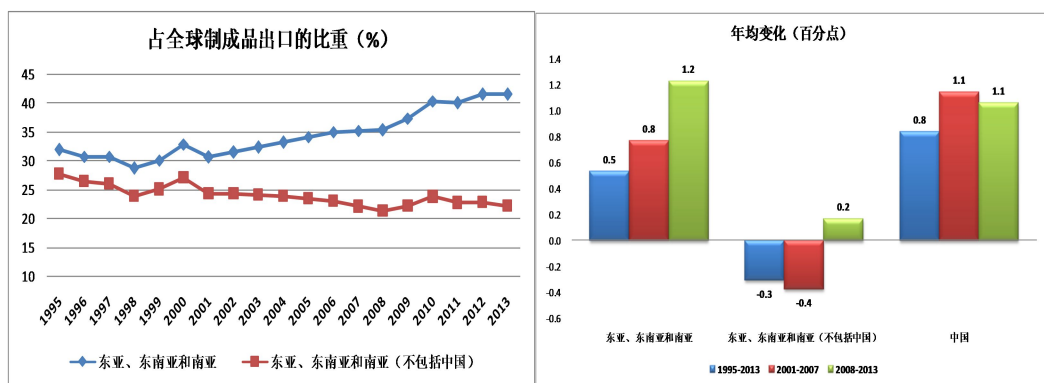


图 19 中国在亚洲制成品出口的地位¹

总之，对于我国制成品出口的未来增长趋势，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在现有的制成品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作为亚洲地区性生产网络上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在经过多年的持续上升以后已经趋于稳定。支撑我国制成品出口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美和欧盟市场上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已经消失。亚洲、中南美洲以及其他新兴市场虽然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但是在短期中无法弥补来自欧美发达市场的增长动力的下降。其次，现有的制成品国际分工格局在短期中不会出现大的跨区域调整或者区域内重新配置。次贷危机以后，无论是东亚地区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地位，还是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都没有出现有别于危机前的根本性变化。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认为，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必然的；但是我国制成品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不会逆转，只是增长速度将会逐步趋向外部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

六、主要结论

(一) 全球失衡调整模式与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变化特点

次贷危机以来的全球失衡调整过程存在两个方面显著的特征。首先是贸易失衡的调整滞后于经常项目失衡的调整，这意味着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调整滞后于金融层面的调整。其次，贸易失衡的调整主要依赖于服务贸易收支的反向变化。在产品贸易失衡规模没有出现明显的逆向调整趋势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失衡的反向调整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失衡调整的主导力量。

短期中，在供给和需求结构没有出现大调整的情况下，需求再平衡政策对全球失衡的调整效果受制于服务的可贸易性。随着境外服务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服务市场可进入性的提高，逆差国通过压缩国内需求，一方面可以降低产品超额需求和对外产品贸易逆差规模，另一方面可以将国内过剩的服务供给转变为不断增长的对外服务贸易顺差。顺差国的调整刚好相反。通过国内需求的扩张，一方面推动产品过剩供给和对外产品贸易顺差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服务超额需求的增加和对外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的增长。这是在这样的调整逻辑之下，服务贸易失衡的反向调整成为推动全球失衡调整的主导力量。

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状况在危机后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产品贸易顺差规模的增速下降、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的增速上升以及总贸易顺差的增速更加显著的下降。这一变化过程基本符合全球失衡的调整逻辑和路径。具体来看，在产品贸易方面，我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势头并没有逆转，这主要得益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在服务贸易方面，旅游服务进口的迅速增长是导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扩张的最重要原因。

(二) 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增长的原因与影响

在国内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内需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服务的超额需求状态，进而增加了对国外服务的需求。专业和商业服务等生产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既可以借助直接的服务贸易，也可以借助以有形产品为载体的间接贸易或者服务业 FDI，因此，对境外生产型服

¹ 数据来自 UNCTAD，这里的东亚包括日本。

务需求的增加不会全部转变为进口的增长和贸易逆差的增加。而对于旅游这类的消费型服务，跨境供给主要依赖于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因此，对境外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直接转变为进口的增长。

由此，我们需要关注开放背景下需求引致型的结构调整政策的效果，特别是国内服务需求增长对国内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首先，由于供给能力的调整过程相对较为缓慢，所以，内需刺激政策虽然能够推动国内服务需求的迅速增加，但是在短期中的影响主要是服务贸易逆差的增加。其次，不同类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模式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生产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更加倚重境外分支机构销售的模式，生活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更加倚重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因此，对境外生产型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带来服务业 FDI 流入的增长，这对国内供给结构调整和服务业扩张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对境外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带来的主要是服务进口的增长，对国内供给结构调整和服务业扩张的拉动作用较小。

（三）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前景

基于我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对比关系，初级产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是弥补国内供给缺口、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必然要求。在短期中，供给能力和需求结构的调整相对较小，因此，对初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状况以及贸易逆差走势不会发生大的趋势性改变。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制成品出口的增长趋势，因为这关系到我国国内过剩的制成品供给能否解决市场实现问题，进而影响我国在现有供给结构下的经济增长态势。

对于我国制成品出口的未来增长趋势，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在现有的制成品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作为亚洲地区性生产网络上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在经过多年的持续上升以后已经趋于稳定。支撑我国制成品出口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美和欧盟市场上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已经消失。亚洲、中南美洲以及其他新兴市场虽然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但是在短期中无法弥补来自欧美发达市场的增长动力的下降。其次，现有的制成品国际分工格局在短期中不会出现大的跨区域调整或者区域内重新配置。次贷危机以后，无论是东亚地区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地位，还是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都没有出现有别于危机前的根本性变化。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认为，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必然的；但是我国制成品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不会逆转，只是增长速度将会逐步趋向外部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